

# 回族与清代金川地域社会的重构和发展\*<sup>1</sup>

曾现江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清乾隆朝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域社会开启重构。不少来自四川内地和西北陕甘等地的回族,相继以随军屯田耕守、移民屯垦及经商贸易、传播宗教等途径,进入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流域,繁衍生息,人口得到较快增长。回族的移入,不仅为金川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安宁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较快恢复和发展,增进区域内外联系,促成金川地区汉、藏、回、羌等民族共居社会的形成,丰富了金川地区的宗教多元性与文化多样性内涵。

**【关键词】**:金川地区;嘉绒藏区;藏彝走廊;清代;回族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6-0093-05

在以多族群共居、多元文化交融并存而著称的藏彝走廊地区,居住着较多的回族人口。究其分布,有四个相对较为集中的区域:一是北端的川甘青毗连地区。二是南端的滇西北地区。三是川西南的安宁河中下游地区。四是川西北金川地区,也就是大渡河上游支流大小金川河流域——主要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小金两县,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部分地区。近年来,藏彝走廊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有关回族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且关注的地域多集中在走廊南北两端:一是从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角度,分析滇西北的“藏回”族群现象<sup>[1]</sup>。二是探讨川甘青毗连地区的回族与藏、汉等族的经济贸易关系<sup>[2]</sup>。金川地区地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生息于此间的回族理应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本文拟就清乾隆朝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回族向金川地区的迁移及其在当地社会重构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等,作初步的分析。

## 一、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域社会的重构

清承明制,在川西北高原陆续设置了数量众多的土司。这些土司虽各踞一地,互不统属,但常因婚姻及争夺土地、人口而兼并仇杀,其中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大、小金川流域的金川寺演化禅师,更是以“强横”著称<sup>[3]</sup>。该土职最早受封于明朝永乐年间,清初仍获颁演化禅师印信<sup>[4] (卷15)</sup>。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授土舍色勒奔安抚司职衔,住牧勒乌围,称大金川土司,“以分金川土司之势”<sup>[5]</sup>,原金川寺演化禅师住牧美诺,改称小金川土司。大、小金川土司与周围相邻十余土司之土著人民,“俱系跣足披髮,步行山箐,谓之甲垄”<sup>[4] (卷51)</sup>。所谓“甲垄”,就是后世所习称的嘉绒藏族。当地嘉绒话称大金川为“促浸”,意为“大河滨”,称小金川为“攢拉”,意为“小河边”<sup>[6]</sup>。

金川地区是典型的高山深谷地形,“跬步皆山,无尺寸平地”<sup>[7] (卷4)</sup>,只有大、小金川河谷两岸的阶地,以及一些位于半山的缓坡地带,尚可种植诸如青稞及黍、荞等作物,加之寒多暖少,气候变化莫测,多大风、冰雹,故出产不丰。耕种之余,人们还需要在高山上蓄养牲畜,如犏牛、山羊等。即便如此,大多人家所得,仍仅够半年食用,因此,很多嘉绒人都在九月秋收

<sup>1</sup> 收稿日期:2016-11-10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培育项目“家园意识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与现实建设”(SWU1709704)。

作者简介:曾现江,男,西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族群与区域文化。

后，挈家带口，奔赴成都、重庆等地州县，“佣工糊口，名曰下坝”，待来年天气趋暖时才返乡<sup>[8] (卷307)</sup>。相对而言，大金川河谷生态条件较好，物产较丰，加之距四川内地州县的路途更为遥远，因而“下坝”者不多<sup>[4] (卷29)</sup>。

大、小金川土司所崇信的，是以占卜祭祀、放咒复仇和祈福禳灾见长的苯教。土司若有数子，通常是以一子居家，娶妻生子，其余诸子入寺为僧，成为本地的宗教领袖，称之为“莎罗奔”或“朗宋”。土司的职位，或由“莎罗奔”承袭，或由在家者担任<sup>[9]</sup>。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教合一体制。土司之下，有大小头人及寨首若干为其奔走效命，管束“番众”，即一般百姓。从土司、大小头人到“番众”，等级之分极其森严，区隔牢固，对土司及头人，百姓“敬之如神明，无一言敢稍拂”<sup>[7] (卷2)</sup>。

虽然雍正元年被拆分成大、小金川两个土司，但二者仍惯于恃强凌弱，频繁袭扰周邻，乃至攻击清朝的绿营官兵。乾隆朝先后两次在金川地区大规模用兵，特别是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更以历时长、投入兵力多、战事惨烈、耗费巨大而著称，且影响深远，乃至被视为是清朝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sup>[10]</sup>。战争对当地的破坏也非常严重。以人口数量而言，大小金川土司属民原不过三万多口，而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统计，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各路官兵共歼戮番民就达12800余人<sup>[11]</sup>。战争结束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及其家属、亲信和大头人等250余人被押送北京<sup>[8] (卷1008)</sup>，另有200余番民被解至北京，于香山脚下建碉居住<sup>[8] (卷1009)</sup>。此外尚有二万余名“降番”，其中15993人，被分赏给派遣士兵随官兵作战的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卓克采、从噶克、党坝、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旺、鄂克什、瓦寺等周边土司，以及杂谷脑五屯，只剩下4331人被留置在金川本地<sup>[12] 78-81</sup>。

清朝平定大小金川之后，以两金川土司之地分置阿尔古、美诺两厅(后合并为美诺厅，再改称懋功厅)，领有五屯，即懋功、抚边、章谷三屯和绥靖、崇化两屯。在此五屯，“陆续安插兵民番练”<sup>[13] 36</sup>。先是留驻6000绿营兵，分单兵和眷兵，授田耕戍，称为“兵屯”。其次是因战争造成当地人口大减，而大部分“降番”又被分赏给周边土司及杂谷五寨，以致金川地区大量土地荒芜，清朝于是大力招徕外地民众前来，按户授地屯垦，即为“民屯”。再次就是陆续设置别思满、八角碉、汗牛、宅垄及河东、河西等六个“番屯”，以安插“降番”。最后是“屯练”，指的是从杂谷五寨移来的150户，其中部分是羌民<sup>[14]</sup>。兵、民、番、练四种屯田，每户(单兵每两名)皆授地30亩，屯兵先占上等地，多为河谷底地，屯民得耕中等地，即半山的坡地，剩余的下等地，即高山上的山地则由屯番、屯练去垦种<sup>[15]</sup>，故民间称作是“官占平、民占坡、蛮家只占山窝窝”<sup>[16]</sup>。在朝廷看来，大小金川土司之所以屡启事端，其根源是当地所信奉的苯教“专事咒诅镇厌”，以邪术惑人，故下令在金川地区禁绝苯教，其寺庙或被摧毁，或为屯兵所住，最大的本教寺庙雍中喇嘛寺则被改建成黄教寺院，由朝廷从北京、西藏选派黄教喇嘛驻锡管理<sup>[12]</sup>

92-94。

由此，经过第二次金川之役，以及战争结束后清廷的一系列善后措施，以土司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在金川地区已全然不存。随着兵屯、民屯、番屯及练屯的相继建立，大批外地民众陆续迁入，金川地区也相应地开始了地域社会的重组建构，从政治、经济，到宗教、文化与族群分布格局，都有显著的变迁发生。回族较大规模进入金川地区，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 二、回族迁入金川地区的主要途径及分布特点

回族先民进入川西北高原，大致可追溯至13世纪中叶。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由临洮南下，在今川甘交界处兵分三路，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据称一些跟随蒙古军征战的色目人就此开始在川西北地区屯垦，随后又有一些回民因经商、出仕等原因在此地落籍。明初，有回族随平羌将军丁玉进驻川西北的松潘、茂州等地，随着川西北高原成为明代西北甘青地区与内地往来的交通要冲和重要的茶马贸易通道，又有不少陕甘地区的回族商贩进入岷江河谷两岸，并向西进入岷江西岸支流杂谷脑河流域<sup>[17]</sup>。不过，总体来看，元明时期进入川西北高原的回族先民，主要活动地域仍限于岷江流域，尚未较大规模进入金川地区活动。

回族进入金川地区，主要始于第二次金川之役，特别是战争结束后，不少回族相继以随军屯田耕守、移民屯垦及商贾贸易等途径，来到金川地区生息活动。

在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清廷从 14 省、营及 18 路土司累计调集满、汉、屯、土官兵多达 129500 余名<sup>[18]</sup>。各路官兵除来自四川本省外，以陕甘地区的绿营兵最多。因“陕甘兵素称强壮，且与川省毗连”<sup>[8] 卷 896</sup>，先后有八批，累计 28500 名陕甘绿营兵奉调金川<sup>[8] 卷 941、979</sup>。由于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分布较广，故从此地征调的绿营兵丁中有部分回民。当然，征调自四川等地的绿营官兵中亦有回族。战争结束后，部分绿营兵丁留驻金川，由朝廷统一分拨土地、种籽、耕牛等生产生活物资，分汛屯戍，并“必令兵丁携眷居屯，始堪永久”，从而成为兵屯户<sup>[12] 116</sup>。在这些兵屯户中，不乏来自四川和陕甘等地的回族。据调查，仅懋功屯的兵屯户中，就有 50 户是回民<sup>[19]</sup>。川北盐亭县的回族周氏，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随军移驻懋功屯，至清末已成本地大姓<sup>[20]</sup>。当地另一回族大姓马氏，祖上六兄弟皆在清军中任职，大小金川平定后留驻当地<sup>[21]</sup>。章谷屯回族中历史最久、人口众多的毕姓，祖上则是原籍陕西的随军屯户<sup>[22]</sup>。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1784—1789 年)任绥靖屯务的李心衡，在《金川锁记》中也记录了两员回族军官，一是来自甘肃的游击马氏，二是来自川北阆中的甲咱汛汛官古一德<sup>[7] 卷 4、5</sup>。民国初年的《两金风物志》甚至认为金川地区的 300 户回民都来自行伍<sup>[23]</sup>。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调查亦称金川地区回族“主要也是随军来的”<sup>[24] 11</sup>。综上可知，随军屯田耕守，实为金川地区回族最主要的来源。

移民屯垦是回族进入金川地区的另一途径。金川屯民主要来自川内及西北陕甘地区，尤其以“小川北各县”的人居多<sup>[13] 53</sup>。所谓“小川北”，指的乃是清代川北道以北各县，其中盐亭、阆中等县本有较多的回族分布，他们中的一部分应朝廷招徕，前来金川屯垦。另据调查，小金县城(即清代懋功厅治之地)的回族，则多由都江堰、成都等地移来<sup>[25]</sup>。陕甘地区的回民亦有迁入金川地区垦种者。清光绪《懋功厅乡土志》载：“由陕甘迁来者，多奉回教”<sup>[26]</sup>。章谷屯回族中的苏、马、白、兰、余、张等姓，也都是陕甘移民后代<sup>[27]</sup>。

金川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也吸引省内及陕甘、青海等地的回族商贾前来，他们大多“开店为生，一有倒闭，即行转徙”<sup>[26]</sup>，但也有部分在金川地区定居的<sup>[23]</sup>。特别是从清光绪年间起，金川地区大量种植鸦片，以鸦片为主的贸易市场随之兴盛。每到秋季，陕甘地区的回族商人(以甘肃洮州回商为多)就带着货物及现金，前来交换或收购鸦片，再转运贩卖到西北各地，有的则定居下来<sup>[28]</sup>。

除以上三种途径外，亦有个别外地回族阿訇因前往金川地区主持清真寺教务而留居当地的<sup>[29] 809</sup>。

回族移入金川地区的途径虽多，但最主要的还是随军屯田耕守，其次是移民屯垦，而这两种途径，都是在清王朝的主导下展开，并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便利。除屯田兵丁自不待论外，无论是屯田兵丁的家眷，还是应招前往金川地区屯垦的民户，都由各地州县发放路费、口粮，沿途接待；抵达金川后，不仅优先授予相对较好的所谓上等、中等田土，六年内免纳赋税，而且还由朝廷统一分拨房屋，无房则支付银两，又统一发放农具、耕牛及种籽，青黄不接时准其赴屯仓借贷<sup>[7] 卷 3</sup>。清廷上下的扶持，加之金川地区正处于社会重建之中，使得迁入的汉、回各族人民较少遇到社会阻碍，迅速适应自然环境，很快安定下来，繁衍生息，人口得到较快增长。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不出十余年，金川地区就“生齿日繁”<sup>[8] 卷 1291</sup>。清道光时郑光祖所辑《金川旧事》已称“番地回人不少”<sup>[30] 4</sup>。到清末，回族周氏已成懋功屯屈指可数的大姓<sup>[20]</sup>。金川地区回族人口较快增长的另一个典型个案是，章谷屯的毕姓回族，最初随军耕屯时仅有 1 户，第四代发展为 3 户，第五代发展到 14 户，第六代已有 24 户<sup>[22]</sup>。清末民初，金川地区的兵屯、民屯皆废，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屯民就地落籍。据民国初年《两金风物志》估计，金川地区的回民约有 300 户<sup>[23]</sup>。20 世纪 50 年代初，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查得知，小金县有回族 145 户，783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金川县回族 177 户，945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1%<sup>[24] 8-9</sup>。同时期也有的调查称金川县有 1200 名回族<sup>[29] 223</sup>。加上丹巴县原章谷屯地区的回族人口，估计 20 世纪 50 年代初金川地区回族人口当在 2000 以上。

由于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迁入金川地区的回族以兵、民屯田为主，辅以经商贸易及传播宗教等，故其分布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主要分布在海拔一般不超过 2500 米的大小金川河谷地带。这些邻河地带交通较为便利，气候也较温和，相对适宜农业生产生活。在更高更寒的半山、高山地区，则甚少有回族定居。二是在大小金川河谷两岸广泛分布，并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的小规模聚居区——主要是各绿营兵屯驻地周围及懋功、抚边、绥靖、崇化、章谷五屯的屯署所在地，具有“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 三、回族对金川地域社会重构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

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以多种途径陆续迁入金川地区的回族对当地的地域社会重构、发展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从下述诸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维系金川及其周边的长期稳定、安宁。金川地区虽然僻处川西北高原一隅，但“西北通甘肃回部，西南控三藏”<sup>[7]</sup>卷<sup>2</sup>，地缘地位突出，对于清朝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的稳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清廷不惜在此持久用兵的原因之一。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后，清王朝为加强在当地的统治，除要求兵屯和民屯“声气联络”外，还使降番“错处杂耕，驯就铃束”<sup>[12]</sup>74。金川地区的社会秩序，随着屯田制度的陆续建立、完善而得以迅速稳定，很快就出现了“边境救宁”、“远近番民，安居乐业，直与内地无殊”的局面<sup>[12]</sup>132、109。故三年之后，清廷就将金川的驻屯兵裁减至3000名<sup>[8]</sup>卷1094。事实上，从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到清亡，虽长达130余年，但金川及川西北嘉绒藏族地区一直较为稳定，再未发生过大的事端，这自然离不开回族等各族人民在当地的长期屯守。

因金川地区长期稳定，故屯田兵丁频繁奉调外出征战。以绥靖屯为例，从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五年（1776—1825年）的五十余年间，该屯的屯兵额设虽由865名减至634名，但先后出征过廓尔喀、湖南、湖北、宁陕、青海果洛克及川内达州、川北、瞻对等地，累计阵亡或征途病故多达240人<sup>[31]</sup>卷5。这其中，理应有回族官兵。咸丰同治时期，金川屯兵亦奉调与太平军作战，其中懋功屯的回族周氏一门三兄弟皆阵亡于军中：三弟天培官至湖北提督，咸丰九年阵亡，长兄天孚官至湖南提督帮办，次兄天孚官至参将，皆于咸丰十年阵亡，四弟天桂、五弟天禄亦为军中将弁<sup>[32]</sup>。咸丰年间，祖籍四川盐亭县的金川回族军官江长贵亦率屯兵与太平军作战<sup>[33]</sup>。可见，在金川屯田耕守的回族官兵，不仅镇戍一方，而且为维护清朝的统治，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小的牺牲与贡献。

第二，为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区域内外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次金川战役之前，清王朝及两金川土司都不同程度地限制金川与周边——尤其是内地的人员及物资往来。如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后，清廷颁布的“善后事宜”，首先就是禁止内地人民出入金川地区，即便是日常的“番民贸易”也要严加察验<sup>[8]</sup>卷336。金川本属偏僻之区，本地高山深谷且沟壑纵横的地形已极大地制约了对外的交通与联系，再加上朝廷及土司的人为限制，这势必导致金川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不仅生产技术落后，而且农作物品种不多，当地“只有大麦、小麦、青稞、黍稷、荞粱、豌豆、胡豆、天星米之属，有平生未见稻米者。……夷俗亦知用牛马耕耨，但牛则扼其两角，马则钩其鞍桥，运犁无力，未得深耕易耨之法，故劳倍功半”<sup>[7]</sup>卷4。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大量汉、回人民陆续来到金川地区，首先是促使社会生产较快恢复，大量土地得到开垦，不出十余年就“几无隙地”<sup>[7]</sup>卷3。其次是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近因内地屯民栉比，多仿汉式独牛锐锄之制，农工简便，倍于曩昔”<sup>[13]</sup>62。再次是将大量内地的农作物品种带到金川，诸如粟、糯黍、玉蜀黍、蜀黍、燕麦、苦荞、甜荞、糯粟、四季豆、红豆、黄豆、冰豆、火麻、蛮麻、油麻，以及多种瓜果、蔬菜等，都很快在当地得到种植<sup>[31]</sup>卷4。此外，回族商贾的活动，不仅推动金川区域内外商品贸易网络的形成，促进了金川地区与四川内地及西北陕甘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增强了金川社会的流动性。

第三，促进了金川地区多元文化共存、多族群共居社会的形成。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随着汉、回、羌等族相继移入，金川地区的族群分布格局也相应发生改变，由原先嘉绒藏族聚居变成了汉、藏、回、羌等族群共居。在此种多族群聚居格局中，回族虽然只占人口总量的大约3%—5%，但因其主要是兵、民屯户，以及少量的商贾，故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中小金地区的“懋功保路同志会”就是以回族为主筹建起来的，即可见一斑。随着回族的移入，回族文化也相应传入金川地区。据《金川锁记》载，金川地区的回族仍使用回历，“回人于正朔长至令节外，复于岁中扣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周。是日互相往来，登堂称贺，不计闰，不计大小尽，不计冬夏，总以周天为度”<sup>[7]</sup>卷2；驻屯金川的回族官兵，依然信奉伊斯兰教，如绥靖营游击马氏、汛官古一德等回族军官皆是如此<sup>[7]</sup>卷4、5。随着人口增多，回族在金川地区陆续修建了多座清真寺。在大金川地区，绥靖屯署和沙耳、庆宁、喀尔、安宁等地都先后修建有清真寺<sup>[29]</sup>143—145。小金川地区的回族，也在懋功屯营盘街和日隆、抚边等地建有多座清真寺<sup>[19]</sup>。在与汉、藏等族密切交往互动的同时，金川回族仍保持自身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崇尚清真，偶与汉家联婚，饮食礼节，男女各从其类”，“回、汉同居异食”<sup>[34]</sup>。伊斯兰教及回族文化

---

的传入与发展,无疑极大丰富了地处藏彝走廊核心地带的金川地区的宗教多元性与文化多样性内涵。

#### 参考文献:

- [1] 白志红. 藏彝走廊中“藏回”的民族认同及其主体性——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藏回”为例 [J]. 民族研究, 2008(4). 李红春, 张实. 关于云南“藏回”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 [J]. 中国藏学, 2008(2). 李志农, 李红春, 李欣. 藏彝走廊“藏回”文化特征探析——以迪庆“藏回”为例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8(6).
- [2] 马平. 近代甘青川康边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 [J]. 回族研究, 1996(4). 马尚林. 历史上藏彝走廊的回藏贸易简述 [M] //袁晓文. 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群互动与发展.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
- [3] 年羹尧. 奏陈川省地方应行事宜折 [M]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 [4] 方略馆. 平定两金川方略 [M] //清乾隆十全武功档案暨方略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 来保. 平定金川方略:卷1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986.
- [6] 皇朝文献通考:卷286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986.
- [7] 李心衡. 金川锁记 [M] //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彙编:第四十三册 [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
- [8] 清实录·高宗实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9] 《阿坝州文库》编委会. 保县志:卷8 [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
- [10] 戴逸, 华立. 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 [J]. 历史研究:1993(3).
- [11] 庄吉发.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175.
- [12] 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金川案 [M]. 成都: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63.
- [13] 吴德熙. 章谷屯志略 [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 [14] 林俊华. 为清戍守边防的丹巴羌族 [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2).
- [15] 凌纯声. 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 [M] //凌纯声. 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 1979.
- [16] 李涛. 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戎地区的影响 [J]. 中国藏学, 1993(1).
- [17] 张泽洪. 四川伊斯兰教历史文物述略 [J]. 四川文物, 1995(1).

- 
- [18] 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 [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1:5.
- [19] 江文. 简述小金宗教 [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小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辑部. 小金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小金: [出版者不详], 1992.
- [20] 李增祜. 新修懋功屯乡土志略:氏族 [M]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七册. 成都:巴蜀书社, 2009.
- [21] 马兴云. 小金回民风土人情侧写 [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小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辑部. 小金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小金: [出版者不详], 1989.
- [22] 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261.
- [23] 李家瑞. 清代川西北藏族地区的土屯制与屯田制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4).
- [24]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 [25] 小金县地名领导小组.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地名录 [G]. 小金: [出版者不详], 1983:20.
- [26] 兴元. 懋功厅乡土志 [M]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7册. 成都:巴蜀书社, 2009.
- [27] 周晓东. 丹巴回民概况 [G]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康定: [出版者不详], 1996.
- [28] 四川省编辑组. 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359、261—262.
- [29] 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金川县志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4.
- [30] 郑光祖. 金川旧事 [M] //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彙编:第43册.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
- [31] 绥靖屯志 [M] //四川府县志辑:第66册. 成都:巴蜀书社, 1992.
- [32] 李增祜. 新修懋功屯乡土志略:耆旧录 [M]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7册. 成都:巴蜀书社, 2009.
- [33] 张理明. 小金县历史概况 [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小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辑部:小金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小金: [出版者不详], 1988.
- [34] 刘文增, 周汝梅. 抚边屯乡土志:人类户口风俗宗教 [M]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7册. 成都:巴蜀书社, 2009.